

玉渊杂谭

马戏这样的非遗有价值吗？

文·句艳华

最近,河南新野四名耍猴人二审被判无罪,读罢新闻为这几位艰辛的民间艺人高兴。对几位河南农民我怀有同情。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他们还在从事这种与流浪无异的生计,绝对不是因技痒难耐,还是在于那微薄到几乎可以忽略的收入——底层人的不幸和悲哀,不在场的人往往并不理解,十指不沾泥的都市人应报以一抔心酸的同情。

下诸多愚民,也不应受过多谴责。耍猴人是无知无助的,但要猴等马戏表演这类已与现代社会和现代意识相悖的杂耍不应该再继续发展了。

非戏之路也要向“磕头”国学的方向发展?就我个人的经验,耍猴并未给我带来精神或者视觉上的愉悦,而是挥之不去的阴影。街头的耍猴表演往往粗鄙,毫无审美和艺术性可言,并且掺杂耍猴人对猴子的暴力,让童年的我不忍卒睹。这对少年儿童心灵发育毫无益处。通过荧屏看到的马戏表演比起街头耍猴当然相对精致讲究,但仍旧给人一种扭曲动物本性的感觉。

情”。或许这样的情形是存在的,但这仍旧改变了动物表演的本质,那就是暴力驯服,以强凌弱,正如妇女儿童被拐卖后在新家庭中即使产生感情,但仍旧无法改变人口贩卖这样的罪恶本质。

历史学家陈垣在北京教书时,他的三儿子陈约则呆在老家广东。陈垣只能通过书信来督促指导这个儿子。

一次,陈约告诉父亲,他学“国学”,但不知从何学起,不知何者该读何者不该读?陈垣教导儿子:“无所谓国学。国学二字太笼统了,不如分为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等。”

目标明确了,“从何学起”的困惑便消解了。

陈垣一直呆在老家,向父亲抱怨,家中藏书不丰,读书环境不佳。陈垣劝导,读书要根据环境调整目标:“如果家藏书丰富的,则宜于博览;如果家中书籍少的,则宜于专精。”既然无力购买大量的书,又没有图书馆可以利用,陈垣建议:“唯一方法是先专精一二种,以备将来之博览。”

古人云:素其位而行。陈垣告诉儿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充分利用环境,“不能因未有书遂停止不学,等有多书乃学。”

陈垣多次对儿子强调,想成才,“适应环境”非常重要:“一个人最要紧是能够善用自己环境,所谓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不管在甚么境遇中,要尽行利用自己境遇,如遇时走马,遇水则行舟,不必对于目前时不满也。”

听了父亲的教导,陈约踏踏实实把家中仅有的几部经典读完,学问见识随之大长。

1931年,日本悍然挑畔中国,很多青年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陈约来信,谓国事岌岌之际,无心读书。

陈垣回信批评了儿子:“此次来信说日本事,云读书非其时。然则我辈舍读书外,尚有何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正是吾人向学要诀。”

为了让自己接受自己的建议,陈垣以自己为例:“我本来就是一读书之人,于国家无大用处。但各有各人的本份,人人能尽其本份,斯国可以不亡矣。难道真要人人当兵去打仗方是爱国耶?我对国事亦极悲愤,但此等事,非一朝一夕之故,积之甚久,今始爆发。在历史家看来,应该如此,又何怨耶。我不能饮酒,到不高兴时,报亦不愿看,仍唯读书,读到头目昏花,则作为大醉睡卧而已。”

年轻人有热血当然是好的,但“无心读书”对国家又有何利?胡适曾对学生说,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是把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陈垣对儿子这番教导与胡适的话可谓异曲同工。

陈约学了一段时间的法律,预备当律师,但不久又生厌倦之心,说当律师与自己性情不合,便向父亲发牢骚,说想改行。

对此,陈垣提出批评:“合不合,习惯耳,余于医亦然。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

陈垣知道所谓“性情不合”,是儿子偷懒的借口,于是,对症下药。

陈约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古文。对于古文,历史大家陈垣当然有很多心得体会,指导儿子自然驾轻就熟:“《论》《孟》《庄》,司马文皆可背诵,《骚》,陶则纯文学而已,归有光等则浏览足矣。《韩非》《商君书》不可不读(论严谨,韩胜于庄)。其文深刻谨严,于治学文有益。余生喜看陶潜乾上谕,其文皆深刻入里,法家、考证家均不可不阅也。”

虽三言两语,却高屋建瓴。儿子因此少走许多弯路。

年轻人一旦走入社会,当然免不了和人打交道,也会有自己的交际圈。儿子陈约有了职业后,陈垣提醒他交友要慎重:“交友要要,不交友则孤陋寡闻。但要识人,谁为益友,谁为损友,别择甚难。学问、道德、能力,三者最要。每交一友,必自审曰:此人学问能益我否?此人道德能益我否?此人能力能助我否?能则大善矣。反是则问此人能累我否?害我否?能则大害矣。此择交不可不慎也。”

子曰:无友不如己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为了让儿子更好地理解交友重要性,陈垣的分析比孔老夫子细多了。

当陈约有机会走上讲台后,陈垣一方面为儿子感到高兴,一方面也担心儿子不

人物纪事

信 细如发

文·魏邦良

能胜任教职,就在信中传授了“讲授法”:“讲文,最要紧注意学生听懂否。如有一二人不在心,是学生之过。若见全班都不在心,则必定教者讲得不明白或无兴趣,即须反省,改良教法,务使全班学生翕然为妙。至于批文章,尤要小心。说话宜少,万不可苟且。学生家长自有通人,教习批改不通,易招人笑柄,必须慎之又慎,不可轻心相掉也……上堂要淡定,改文不可苟且,但不必多改,最要改其错用及错写之字,批改宜少而不苟。”

为了让儿子能站稳讲台,陈垣不厌其详,面面俱到。其絮絮叨叨的苦心婆心,一如孩子首次出门时家长的千叮万嘱咐。

作为教师,如何避免出错,如何提高自己,如何和学生相处。这些方面,陈垣也把自己的经验全部教给儿子:“《学举隅》常看,《康熙字典》常检,至紧要。《孟子》《论语》宜熟读,文气自畅;曾读过之古文,亦宜常温。此古文也……对学生宜和藹亲切,多奖励,令其有兴趣。”

句句是看家本领。所谓“家学”,这就是了。

当语文教师,得会改作文,对此,陈垣的指导如下:“文言目前最要是学改文,如何改法,非下一番工夫不可。最好将《后汉书》与《三国志》同有之传,如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吕布、张邈、张鲁、臧洪、公孙瓒、陶谦、荀彧、刘焉、刘璋、华佗等十四传,以《三国》为底,与《后汉》对照,看《后汉》如何改作,即可悟作文及改文之法,于自己及教人均大有裨益。”

为了改好作文,竟然要把《三国》与《后汉》对照,可见陈垣对儿子的要求很严。陈约忙于教学,没有时间写文,著书,便以利器晚成的严先生自慰,说:“严先生亦四十一岁始研究《通鉴》,则来日方长。”

陈垣批评儿子,不可如此自我安慰:“此语又错了。人家引此鼓励你则可,你自己以此为安慰则谬矣。同是一句话,要问是何人说,即此谓也。”

宽慰别人,是礼貌;宽慰自己,是懈怠,是逃避。

由于种种原因,陈垣和自己的儿子相隔万里,聚少离多,但他却通过一封封书信,向儿子灌输读书做人的道理。他给儿子的信内容广泛而具体,有批评有表扬;指不不厌其详,督促饱含热望。可谓用心良苦,“信”细如发。在其教导、督促下,儿子所处环境虽不佳,终历经坎坷,自学成才。



二十世纪初六十年代陈垣在廊坊书屋

打油诗咏雪

文·林之光

《辞海》记载,打油诗是诗体的一种。据宋钱易《南部新书》,中唐时代有胡打蛟、张打油二人皆能为诗。张打油最著名的《雪诗》就是:“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此类诗句所用都是俚语,不苛平仄,通俗易懂,且调侃幽默趣味横生,深受民间喜爱,有很强的生命力。后人借张打油之名,称这类诗为“打油诗”。

该书中说胡、张二人是诗友。有一年冬天,二人在一起饮酒,忽见外面大雪纷飞,大地白茫茫一片,张打油触景生情,即兴创作出了上面那首打油诗。

胡打蛟一听赞道:“张兄的咏雪诗独树一帜,也是猜雪的谜题,弟不揣冒昧,也作一首,请指教。”诗曰:“漫天飞,扑地坠,白占许多好田地。冻杀黎民都是你,什么祥瑞不祥瑞!”

张打油一听也连连叫好,说我再作一首,也请试猜:“此花自古无人栽,一夜北风遍地开。近看无枝又无叶,不知如何长出来?”

两位诗友以诗猜诗兴致越来越高,胡打蛟接着又吟道:“天地玉世界,漫天散飞花。远岸飘柳絮,前村压梅花。青竹凝玉树,万枝变琼柯。窗含远山白,落鬓添白发。”他们两人一唱一和,虽名为咏雪,但却不见一个雪字。

实际上,打油诗不仅民间喜爱,甚至著名诗人偶尔也写打油诗。

例如,明代大学士解缙,一日见京城午门外军士,用雪堆一和尙,当时就吟出了《雪僧》打油诗:“此僧从未入娘胎,昨夜天官降下来。暂借午门投一宿,明朝日出(雪化)往天台。”再如清代著名文人金圣叹,因冤案入狱,闻斩当天降大雪,他触景生情吟出《泪花诗》一首:“苍天为我报了仇,万里江山尽白头。明日太阳来相吊,家家户户泪花流。”据记载,乾隆某年冬天,偶见下雪。他信口吟道:“一片一片又一片,此时文思戛然而止。还是随行大臣纪晓岚赶紧接上道:“飞入梅花都不见”,因为梅花也是白的。于是既救了急,又把本不像诗的三句,组成了一首极妙的诗。当然,以上都是传说,未入正传的。

不过,雪虽美,还“瑞雪兆丰年”,但雪多了肯定有害。唐代罗隐《雪》诗就曾说过:“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赵孟頫打油诗中最生动的可能要数陆时伯的雪诗:“大雪洋洋下,柴米都涨价。板凳当柴烧,吓得床儿怕。”因为板凳烧完,就该烧床了。

有趣的是,大雪有时对穷人也有好处。据清袁枚《随园诗话》中载,江西魏允迪,为人浪漫不羁,去官后穷居深山,正愁人来讨债:“寂寞山崖共水滨,漫天匝地白如银。前村报道溪桥断,可喜谁来索债人!”

打油诗还有多人联句的。清代山东青州有个叫赵秉忠的中了状元,地方官员宴请,席间大家要求赵秉忠作诗。赵让大家共同联句,并起句说:“剪碎鹅毛空中舞”,县官等续句曰:“山南山北不见土”,“琉璃碧瓦变成银”,赵秉忠补足全诗——“面糊糊了青州府”。据说赵秉忠最后一句时,见外面雪越下越大,又听说青州府官员糊涂无能,又见他们喝得东倒西歪,因此才结句讽刺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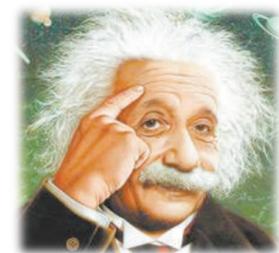
涅瓦河畔(油画)

阿廖娜·瓦西里耶娃(俄罗斯)

科林碎语

爱因斯坦的哲学

文·李泳



爱因斯坦不是哲学家,却与哲学有很深的渊源。他不像温伯格(Steven Weinberg)那样说哲学对物理学没什么用,也不说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而是真心同情哲学。他晚年给桑顿(Robert A. Thornton)的信(1944年12月7日)说,他完全赞同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方法的意义和教育价值。可很多人,甚至职业科学家,都缺乏那种眼光,见过千万棵树却从没见过森林。他认为,大哲学和哲学的背景帮助我们克服当代人的偏见。是否具有哲学眼光,是区别“匠人”和真正的真理探求者的标志。可是具体说来,爱因斯坦的哲学却不似他的物理那么“纯”。

爱老70岁时总结说,从系统的认识论来看,科学家不过是肆意无惮的机会主义者;当他描述独立于感觉的世界时,他是实在论者;当他认为概念和理论是人类精神共同发明,而不能从经验逻辑导出时,他是唯心论者;当他认为概念和理论只有为感觉的经验关系提供逻辑表示才算合理时,他是实证论者;当他认为逻辑简单性是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有用工具时,他也可以是柏拉图或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这种哲学的“杂糅”,模糊地“涂抹”出一条爱因斯坦哲学演化路线,而这条线恰好平行地引出现代物理学的数学化(特别是几何化)的路线。

多情的哲学家都喜欢将爱老拉入自家的门派——犹如多情的辩证法把一切科学装进自己的竹篮一样。相对论刚出世不久,实证论的祖师爷石里克(Moritz Schlick)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当代物理学的空间和时间》,宣扬相对论的哲学意义,特别是实证论的意义。

青年爱因斯坦确实信过经验论,也自以为马赫路线的人。他在自述里说,他

小时候喜欢“直接与经验接触”,1930年出版的一本《爱因斯坦传》(Albert Einstein, a biographical portrait)说,小爱只想物理实在的问题,不太相信数学的力量,是一个纯粹的经验的主义者。大约18岁时,小爱在朋友贝索(Michele Besso)的引介下读了马赫的《力学史》。马赫对牛顿的绝对时空的批判动摇了小爱对“力学作为一切物理学思想的最后基础”的信念,为相对论指引了概念方向。例如,狭义相对论以时空的认识为物理的基础,以“事件”体现实在与感觉的统一。还有它的“操作主义”的时间和长度的测量,都使小爱显得像一个实证论者,所以维也纳圈子的哲学家们欢呼相对论极大推动了“我们时代的哲学”。而广义相对论的等效原理,更是马赫对牛顿水桶实验批判(惯性源于物体的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1913年6月25日爱因斯坦给马赫的信如是说)。

奇怪的是,就在小爱给马赫写信那会儿,老马“变心”了。在《物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hysical Optics)的前言(标明时间是1913年7月)里,马赫宣布他不接受相对论,也不承认自己是相对论的先驱——大家知道这一点是在老马去世5年后——《物理学原理》在1921年出版的时候。1922年,老爱在巴黎与反马赫哲学家梅耶逊(Emile Meyerson)谈话时,说马赫是“优秀的力学家,可悲的哲学家”。

马赫没说什么“变心”,他答应在“续篇”里细说,但我们没看到下文。老马大概是发现了小爱的“背叛”。原来,小爱所说的“感觉”根本不是老马的“感觉”。小爱的经验,如光速不变和等效原理,以及更早的永动机、热分子运动等,都不是直接的感觉的“基元”,而是“所有物理经验的综合”。在“真”马赫主义者看来,它们不是感觉的经验,而是近乎“假定”的东西。小爱的“反心”其实早就萌芽了。在1901年,小爱告诉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n),帮助他完成广义相对论数学的朋友),认识复杂现象的统一真是奇妙的感觉;而对直接的感觉经验来说,那些现象是相互分离的。小爱从经验感觉来的是“统一”,是概念,那是他的感觉方式,所以不觉得有“假定”的成分。他却不知这已经超出了马赫的“底线”。

老爱晚年回忆,他对马赫哲学的态度转变大约就发生在1900年后不久——也许

就是他给格罗斯曼写信那个时期。他发现,他对从已知事实来构建理论的方法感到失望了,而且越来越失望;最后终于明白,只有发现了普适的形式原理才可能得到确定的结果。

小爱似乎只是在“操作”意义上借了马赫的感觉经验,他骨子里想的还是康德的先验概念。经验对他只是一个与物理实验相关的“借口”,最终他还是“皈依”了形而上学:1930年11月28日,他给石里克写信说,你的表述没有代表我的概念,你太实证了……我坦白告诉你,物理学是从概念去构造现实世界的模型及其法则结构……“你会惊讶”形而上学家’的爱因斯坦,但每个四脚和两脚的动物在这个意义上本来就是形而上学家。”

1933年,老爱在牛津大学演讲《理论物理学的方法》时,终于道出了他自己的“经验论”:我们的经验令我们相信,自然是最简单的可能数学思想的实现。而演讲开头的一句话更有意思:对科学发现者来说,想象的话是自然而然,所以不该认为是思想的创造,而应看作本来的实在。在一定意义上,“我相信纯粹的思想能把握实在。”在老爱看来,想象约等于实在——这不但把经验推得更远,也把自然拉得更近。这当然是康德的“为自然立法”的传统。

不过,老爱对康德的“先验”概念也有过动摇。1918年夏他给玻恩(Max Born)写信谈读《形而上学导论》感想,认为“必须把这个‘先验的’冲淡为‘约定的’”。几十年后,玻恩在通信集里批注说,那会儿小爱更喜欢休谟,是个十足的实证论者。不过从其他文献看,老爱似乎从来没有“失足于”经验论,顶多是河边湿脚而已。“约定论”是大数学家彭加勒的概念。1921年,爱老师在普鲁士科学院报告《几何学和经验》(Geometrie und Erfahrung)时明确表态:“从永恒的观点看,彭加勒是正确的”。可是一年之后,在同法国哲学家们讨论他与康德哲学的关系时,老爱却“没有立场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康德,任意发明的概念对构建科学是必须的——至于先验的还是约定的,我无可话说。”

我们从爱老师在不同时空的言论,可以看到他在哲学上的“摇摆”。但不管怎么摆,最后都落向一个“基点”:概念是自由发明的,不是从经验得来的。物理学从这个起点出发走进了新时代。